

清华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Ⅲ)

社会思潮理论前沿求索

林泰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III)

社会思潮理论前沿求索

林 泰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改革开放以来,林泰教授一直把“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作为学术研究方向,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矛盾、社会思潮的热点、难点、疑点,以及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有效地进行思想教育。他的某些文章和讲座曾对全国高校有广泛影响,本书就是从他二十年来发表的文章、著作中选编的。全书环绕“改革的方向、道路”、“人的本质及人生价值”、“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及其学科建设”三个主题,分五方面内容进行编辑:一、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现实、成就与挫折;二、改革道路的思想碰撞与理论导向;三、人生价值观的理论思考;四、意识形态若干问题辨析;五、思想政治教育的继承与创新,共30多篇文章、40余万字。本书最大特点是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思潮相结合,党性、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几乎所有文章都直接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社会思潮的理论前沿,不回避矛盾和争论,同时努力以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科学精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有创新性的科学见解。本书对党政干部、特别是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有研究、参考价值,也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学研究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博士生公共课的参考书籍。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思潮理论前沿求索/林泰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7

(清华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Ⅲ))

ISBN 7-302-12933-9

I. 社… II. 林… III. 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IV. D0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9851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责任编辑: 龙铮山

印 装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85×260 印张: 18.5 字数: 424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12933-9/D · 215

定 价: 40.00 元



林泰，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高校思想理论政治教育，曾任校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主任、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等。主编《当代社会思潮论评》、《大学德育新探》、《唯物历史观通论》等著作，论文《新时期思想工作的几点理论思考》曾获中宣部、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联合授予的“全国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奖”，《科学地历史地评析社会主义》等报告分别获北京市第一届和第七届“灵山杯”优秀报告一等奖。另有多篇论文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曾兼任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北京市青年研究会副会长、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教育部社政司“两课”在职硕士学位班教学督导巡视员等。现兼任北京市社科联常委、杭州师范学院双聘教授等。

清华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吴树青 陈先达 黄楠森 莫辉明

编委会主任：张再兴

副主任：赵甲明 艾四林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天义 艾四林 刘书林 李崇富 张再兴 吴 倘

俞可平 赵甲明 曹德本 韩冬雪 蔡乐苏

编委会秘书：朱慧欣

资助单位：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这既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要自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善于从人民群众火热的实践中提炼研究课题，善于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努力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加强对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加强对高校马克思主义专业人才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高素质、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后备人才。广大理论工作者要自觉把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加强思想修养，打牢学问基础，提高研究水平，潜心钻研，严谨治学，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努力成为对祖国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

——摘自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引自 2005 年 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

前言——我的学术探索与追求

我 1932 年生于北京，几乎整个童年都是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屈辱地度过的，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在上小学的路上与哥哥严肃讨论“中国会不会真的亡国”，“中国永远是东亚病夫吗”的惆怅心境。1945 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曾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悦，那年我在天津上初中一年级，也曾极度热情地去夹道欢迎蒋委员长，但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中饱私囊的“劫收”，物价飞涨、民怨载道的情景，美国“友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却不受法律制裁的屈辱……，使人们的爱国热情化为一个个泡沫。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民党反动宣传下，共产党被描绘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共匪”，但是解放军宁肯露宿街头也决不扰民的纪律作风；经济迅速复苏，物价完全稳定给老百姓带来的惊喜；铲除恶霸、黑社会势力带来的社会安定；抗美援朝，“最可爱的人”所体现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英雄风骨；共产党干部在极低的供给制生活条件下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给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天津市和中学党组织的启蒙教育下，我初步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开始确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且在 18 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后来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出现过严重失误，反思自己当时的社会主义信仰中也带有某些过于理想的色彩和空想成分，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旧社会的鲜明对比；当时从老年到青年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豪情和爱国奉献精神；当时的共产党员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仰追求的革命精神，使我终生难忘，成为我对社会主义事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重要精神支柱。后来，我的学术研究始终把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探索作为中心内容，和这一段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1951 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并在毕业时获得优良奖状。但是 1954 年我被选作政治辅导员，却改变了我一生的职业方向。除“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短暂时间外，从此再没有脱离高校学生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当时在校团委，我主要管大学生思想工作，组织过又红又专大辩论等许多思想教育活动。尽管回顾起来，那时在指导思想上有一些简单片面，但是我从中学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学会了面对面的、坦诚的思想交流，更重要的是我深刻地感受到大学生的思想是时代的寒暑表，总是最敏感地反映着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思潮，其表现也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坦诚的，尽管其中包含着许多片面、模糊的认识，但却能提出当时时代最本质、最前沿的问题促使你深入思考。和大学生终生为友，把研究大学生的思想脉搏与研究现实社会矛盾、社会思潮的脉搏相结合，成为我后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我活到 70 多岁，思想还能保持一定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9年,我被调到了学校党委宣传部,后来具体负责学校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工作,还主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这段时间,我静下心来读了马、恩、列、斯、毛的许多著作。深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深感过去在做学生工作时,如能多学一些理论就可能多减少一些片面性。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经历,又总能使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紧密联系大学生提出的社会和人生问题进行思考,并将思考的心得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中,因此受到学生的欢迎。当时,清华党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领导很具体,蒋南翔校长和党委主要领导分别主讲几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并兼做教研室主任,带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队伍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的学风,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真正起到了德育“主渠道”的作用。这种学风后来成为我们这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终身不变的信念和生活方式。几十年来,无论讲课、学术讲座、思想政治教育报告、写文章,我都总是有的放矢地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帮助人们在对立观点的思辩中思考。

“文化大革命”中接受大批判、劳动改造,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值得庆幸的是在各种压力面前,虽然我说过许多错话,但没有说过假话,而且由于有的话触犯了当时校内“砸烂旧清华”否定一切的统治势力,我进了蒯大富的“监狱”,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折磨,但也经受了锻炼。“文化大革命”后,我对自己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进行了反思。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有的同学反映,在“人民公社运动”刮“共产风”时,他们家乡饿死很多人。我相信学生说的是真话,没有搞“大批判”,但当时我的解释是“大和尚的经被小和尚念歪了”,“三面红旗”的方针是正确的,只是被下面的干部搞歪了。“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批判我把毛主席比喻成“大和尚”,是攻击伟大领袖,但认真反思,问题恰恰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失误,我当时的解释是想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辩护,尽管用心良苦,却是不科学的。从此,我悟出:如果中央的指导思想和重大决策出了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很难做到以真理服人的;另外我深深地感到,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以追求党性与科学性、意识形态性与真理性相统一为己任,决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庸俗化为用理论为任何方针政策、包括不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辩护。“文化大革命”中,这方面的问题极大地败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声誉。因此,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历史时期,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我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希望通过严肃的科学的研究,能够对人们存在困惑的重大思潮作出比较科学的、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分析,能够在讲课中努力做到真理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尽量避免将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庸俗化的失误。

经过“文化大革命”“大批判”、劳动改造的多年动荡后,1983年学校党委把我调回参加复建清华文科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参与了社会科学系的筹建与建设,帮助思想文化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创立,90年代参与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及其有关系所的筹建与建设,参与了法律系的复建和台湾研究所的筹建。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深深感到,清华大学原来有着较强的文科力量,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1952年院系调整,对有计划地培养经济建设人才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把清华大学文科并入北京大学等其他院校,对清华大学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一切,简单地说建国后清华大学没有文科教育,“人文精神中断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高校的确立,使学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又红又

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了大批骨干，至今还在发挥重要作用。即使只从文科建设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设置，特别是蒋南翔校长倡导并身体力行地为大学本科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为研究生开设“自然辩证法经典著作选读”课以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教学研究，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并且形成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这正是解放前清华大学文科所缺失的。此外，艺术教育始终没有中断，文体教育生动活泼；科学技术史、校史、学生运动史的研究成果颇丰；文科图书资料完全没有失散等等，也体现着清华大学领导在可能条件下对人文精神的重视。而所有这一切，也为改革开放后清华复建文科，包括发展一些文理渗透的学科创造了一定条件。所以，对清华大学解放前、建国后、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的文科建设都应采取辩证的态度，做两点论的分析。三阶段中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应当继承发扬，也都有其不足之处，需要正视，对任何一个阶段的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都是片面的，不利于清华大学文科的健康发展。

在文科复建中，校领导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1983年教育部何东昌、彭珮云等直接领导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筹建工作，当时校领导林克、艾知生等就讲：“清华文科建设就从思想政治教育起步；否则就不搞文科建设。”作为这一学科建设的具体负责人，从该专业的筹建，招收第二学位生、硕士研究生，筹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到1996年这一学科成为清华大学文科第一个博士点，我都全过程全身心地参与，并为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马克思主义是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在学科建设中，我们特别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只对其中某一组成部分进行专门的研究。这种精神对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科都是适用的，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尤为重要。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问题都是从社会生活、而不是从某一学科角度提出的。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往往要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不是仅仅运用其中某一方面的知识就能分析清楚的。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现在国务院学位办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其中的二级学科来建设，这对于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培养能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将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我特别重视唯物史观的教育，认为它是科学地分析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理论基础。多年来，我和有关同事坚持为这一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第二学位生开设“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课，把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与社会思潮相结合，与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人生思考的疑点、难点问题相结合，学生学后感到这是对他们分析问题最有用的课程。有些理工科毕业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生把唯物史观比喻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物理学”，这是有道理的。从学科创建的第一班起，我们还开设了“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的研讨课程，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运用唯物史观及方法论分析社会、人生问题的能力。

二十多年来，我始终把“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几乎所

有论文和著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写作的。这不是出于个人的偏好,而是由于时代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其学科建设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对对改革道路的探索,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实施对社会主义“超越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围绕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评价;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和改革开放的方向、道路;对人生价值和人生道路的思考,形成种种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严重的挑战,引发了几次思想大论战并进而造成了社会动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有能科学地分析各种社会思潮,既坚定不移地纠正‘左’的僵化的思想,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986 年 7 月,当时教育部副部长彭珮云的题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接班人,立志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奋发有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守在思想政治教育岗位上。——愿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班首届毕业生共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我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选择了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从 20 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国际上,“苏东”剧变,而中国却迈向和平崛起,“一超多强”代替了两霸争夺世界的“冷战”格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矛盾错综复杂;在国内,全方位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成就世人瞩目,被人们称为“黄金发展期”;另一方面,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又被称为“矛盾凸显期”。这些现实的社会矛盾,势必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各种思想矛盾,加上西方或国内的某些思想理论流派(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就会形成一定的社会思潮,在人们思想上造成各种困惑。对大学生影响比较大的社会思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改革的方向道路问题,如“如何正确看待‘苏东’剧变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还存在吗?国有经济能主导市场经济吗?”“中国现在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和怎样才能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现在腐败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共产党能战胜自身的腐败吗?”“为了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可以搞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多党竞争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权分立吗?”“加入 WTO 后,民族经济能独立健康发展、国家经济安全能保证吗?”等等。另一个是人的本质和人生价值问题,如“我们倡导的‘以人为本’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古代民本思想有什么本质区别和联系?”“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吗?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什么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倡导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吗?集体主义和发展个性是什么关系?”“怎样在升学、就业、工作中正确处理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关系,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两个根本的道路问题,一个是“振兴中华”之路,一个是大学生“成才之路”。他们渴望“振兴”,渴望“成才”,对面临的历史机遇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这是大学生思想的主流。但是,对“振兴中华”和自身成长的道路又存在诸多困惑,如果我们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思

思想政治教育就有说服力；真理的颗粒越多，科学性越强，说服力就越大，思想政治教育也就越有效。我认为，这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离开这个问题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对于上述社会思潮，应当说，中央的基本立场、观点是明确的。从根本上说，这得益于我们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纠“左”防右，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党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党性、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能够做到统一的根本保证。但是，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同时“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江泽民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也强调：“我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规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还需要全党同志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胡锦涛在2003年7月1日讲话中也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并且提出了14个“如何认识”的问题，要求全党深入探索。所以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地回答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党建设规律提出的问题，回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的问题，仍然需要全党、特别是思想理论工作者进行艰苦的探索。

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少人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远离”现实性、政治性，只愿作“纯科学”研究的学术倾向。我不知道“纯科学”概念的准确界定是什么，哲学社会科学中确有一部分研究不带有意识形态属性，同样应当给予重视。但是，回避、排斥现实性政治性强的研究就不正确了。邓小平很早就指出：“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①这种学术倾向的存在和蔓延，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某些“泛政治化”的“大批判”使一些人至今心有余悸；“苏东”剧变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误与混乱开始的；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路线正确，成就巨大，但主要失误仍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②这些使一些人把现实的意识形态领域看作难以把握的“风险是非之地”，“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另外，这种学术倾向也受到了西方学术研究的思想影响，他们根据意识形态的价值、利益属性及其不确定性，把意识形态同科学对立起来，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科学性，“没有学术价值”，鼓吹“非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原理探索社会意识形成发展的规律，从而使意识形态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明确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其价值追求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能够把意识形态性、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从而根本否定了资产阶级宣扬的把意识形态排斥在科学之外的观念。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统一仍然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5,306.

是对立的统一、有条件的统一，不是仅凭朴素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感情，或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某些论述的简单套用，就能自发地实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发展的历史中仍然出现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失误，这说明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仍然需要排除教条主义和狭隘功利的影响，排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干扰，经过反复的实践和艰苦的科学探索才能实现。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按照西方意识形态与科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具有科学性，那样就必然走上“远离”、“淡化”意识形态的学术道路。

二十多年来，我和我的一些同事，选择当代社会思潮作为研究方向，主动选择一些人们感到困惑的现实性、政治性很强的问题进行研究，是有相当难度，也是需要理论勇气的。这是因为事物的本质往往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多次的过程才能充分暴露，而现实性强的问题，由于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认识探索过程的局限，不容易一下子把握全部真理性认识。虽然总体上我们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但是，还有一些难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现实生活和理论阐述之间也有很多矛盾的现象，需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思想理论的争论也往往不是简单的对错判断，而是提出了一些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回答的时代课题。在研究中，既要弄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要弄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其僵化模式的界限；既要坚持党的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方向，又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我国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实践；既要敢于正视、正确剖析社会主义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坚持改革，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思想理论流派和体制中一切科学的成分或者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又要抵制其错误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一切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十分重视、正确分析、不断克服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盲目崇拜西方，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这是难度很大、非常严肃的科学的研究工作。一方面，需要研究工作者具有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科学探索精神，另一方面更需要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特别鼓励和积极引导这方面的研究，创造更为良好的学术环境。要在国家研究计划中切实体现对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支持，同时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前提下，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要根据“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精神，对于现实性、政治性强的问题，只要不违反宪法，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允许和鼓励人们进行讨论，逐步形成一种建设性的、生动活泼的讨论与批评自我批评的风气。真理越辩越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展正确意见，克服错误意见，开辟向真理前进的道路。现在，党中央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加强了领导，我相信，这必将推动这方面科学的研究的健康发展。

在我入党 55 周年，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周年之际，我从二十年来发表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方面的文章中，选择若干篇，编辑成册，作为对自己学术研究一段历史的纪念。在选编的过程中，深深感到有些文章的某些观点还不够完善，某些论述还有待深入，因而做了少量的修改和补充，但是总的看其基本观点、思路还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说明,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以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精神,从事现实性、政治性强的研究是可以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的。现在把这些文章整理发表出来,希望能在更长的“历史时空”中继续经受检验,以使我的学术研究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所进步;同时,希望推动更多的青年学者主动关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前沿,关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自己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批判精神为指导,直面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理论前沿,以党性与科学性、意识形态性与真理性相统一的精神求索,这就是我的学术追求。

林 泰

2005 年 12 月

目 录

前言——我的学术探索与追求	V
一、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现实、成就与挫折	
落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思考	3
科学地历史地评析社会主义	1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的断想	21
改革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邓小平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实践的新贡献	28
对社会主义及其优越性与消极现象的思考	37
沉沦—奋起—伟大复兴	
——跨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	46
缩小贫富差别,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51
二、改革道路的思想碰撞与理论导向	
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几点思考	65
国有企业能退出竞争领域吗?	77
国有制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80
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浅析	85
对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思考	
——兼谈两种民主制度的比较	89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几个问题	101
为什么不能搞西方那样的多党制?	111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探析	117
三、人生价值观的理论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价值观	127
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的思考	135
对个人主义的历史思考	143
“经济人假设”与人性自私论	
——兼谈国有企业管理层激励机制的改革	150

当前社会利他行为研究的意义及其多层次表现.....	159
正确理解“价值”、“个人的社会价值”、“自我价值”概念的科学内涵.....	166

四、意识形态若干问题辨析

评“真理多元论”.....	173
两种价值与真理的统一观.....	177
历史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	184
“和平演变”的历史演变.....	190
对精神文明建设形势的科学分析.....	196
精神产品及其分类研究.....	198

五、思想政治教育的继承与创新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继承与创新问题的探索.....	209
新时期思想工作的几点理论思考.....	227
《当代社会思潮论评》序言.....	237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怎样“自立立人”.....	240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几点思考.....	244
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思考.....	250
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制度的特色及其发展.....	254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	263

附：直面社会思潮 求真析理育人

——林泰教授学术思想述评.....	267
后记.....	279

一、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现实、成就与挫折